

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

潘娜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 中国共产党要走向未来,要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必须有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和引导,才能占据科学的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政党文化话语具有政党认同、价值整合和传承建构等主要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党文化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环境及话语传播方式的变化无疑给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要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引导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价值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吸引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理论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解释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制度文化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约束力。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权;政党认同;建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 D 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9)05-014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面临着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应对新的挑战,政党文化话语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要走向未来,要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①,不仅意味着与自身纵向相比更强大,还意味着与那些在世界上执政时间长的政党横向相比更强大。这种强大不仅意味着政治强大和组织强大,更意味着思想强大和文化强大,其中文化强大是根本,是更基础的强大。中国共产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有政党文化的观念支撑和价值表达,必须占据科学的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政党文化离不开话语的建构、引导与传播。话语作为建立文化意义的关键资源,是文化最初的力量来源。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人类思想和表征人类行为的符号系

统,而且是一种预先设定人们存在方式的文化实践。政党文化话语意味着将政党思想和政党行为导入特定方向的价值表达,还意味着把抽象的思想观念同大众更易接受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从而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调整和引导人们适应政党提倡的价值观。话语的核心问题是话语权,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权不仅指植根于社会历史实践所形成的说话或者叙述的权力,还包括把话语转化为权力的能力及对政党文化建设的实践、理论的解释权和引导权。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的功能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国家和民

收稿日期: 2019-06-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中国观对我国文化认同的影响与应对研究”(16CKS02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9CX04031B)

作者简介: 潘娜娜,历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族发展的角度而言,意味着我们迈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就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从世界范围看,尽管我们今天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是呈现出了新表现和新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长周期中开始进入了一轮规模较大的衰退期,而世界社会主义虽然总体上仍然处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低潮期,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主要依托和标志,开始进入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长周期的上升期。”^[2](P45-55)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挑战,从世情来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民粹主义异常活跃,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的迅速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担忧,他们通过舆论和政策对中国群起攻击,通过媒体和网络丑化党的形象。从国情来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民生、民信和民主的问题进一步突出,我们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坐标系中,面临着解决好均衡发展、公平共享及优化社会治理等问题。从党情来看,党不仅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还需要应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而且面临着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如何起引领作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回应并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政党文化作为政党的最深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政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作为指导政党行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态的政党文化,要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3]政党文化需要话语的介入和运用才能将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传递至受众。借用拉克劳的“耦合”概念,政党文化是一个耦合式的建构过程,是将政党文化内部多个分散的议题编

织成一个完整性的话语体系的过程,“耦合”使得政党成员的不同诉求被赋予了“相似的意涵编织进了同一套话语体系”^[4]。正是无产阶级政党文化话语的传播和深耕,使得作为个体的无产者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想象和认同。正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号召下,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汇聚到一起,把建设共产主义和自身的利益诉求联系在一起。政党文化话语具有政党认同、价值整合和传承建构等三个主要功能。

(一)政党认同功能

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身份表达、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体现。根据《西方哲学汉英对照辞典》的解释,话语是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以一些句子或陈述作为它的最小单位。话语的形式包括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等。话语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客体以及话语发生的时空所在等基本要素。话语最早指的是言谈方式或交谈形式,后来更多地被赋予了语言运用的意味。索绪尔认为话语是为了达到传播目的而对语言的实际运用。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萨义德进一步指出话语与文本、叙事的关系。他认为文本使话语具体化,而叙事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之下的言说形式。卢卡奇认为,叙事是“意识形态”在话语中的反映,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也就是说,话语是一种权力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生产手段。

政党文化作为政党发展的深层次表现,蕴含着政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意义体系。政党文化可以通过构建集体认同、重构历史叙事的方式来为政党发展提供某种解释系统。政党文化需要话语的介入和运用才能构建政党认同,政党文化话语形塑着受众对政党的认知判断、情感投射和价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话语的调整与优化创造出一种能为广大成员认同的政党文化,为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导向,也可以起到巩固广大党员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认同、澄清少数人模糊认识的作用。

(二)价值整合功能

政党文化话语是社会价值整合的有效载体,

因为无论是政党价值理念的表达还是政党价值理念的大众化都必须通过选择一定的话语策略来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客观上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成就感,导致个体对集体的归属意识越来越淡漠,甚至出现了社会碎片化和个体原子化的现象。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体制身份,获得了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成为“自由择业者”,陷入孤立的原子化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影响力来整合社会,以应对社会碎片化和个体原子化带来的政党文化认同弱化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话语作为人们传输思想观念和信息的重要载体,可以整合吸收民众的各种思想观点并加以编织。政党文化话语凝练的过程既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也是引领和整合多元价值的过程。政党文化话语既可以通过回应现实满足政党成员乃至普通民众的价值期望,又可以在引领和整合多元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政党认同感,树立政党的组织化权威。

(三)传承建构功能

作为政党文化的重要维度,政党文化话语建构指向了对内传承与对外辐射两个向度,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生发着文化强国建设由内而外、内外一致、相互支撑的传播意旨。其中,内向维度通过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传承相袭,以防止政党文化价值特质的断裂;外向维度通过先进政党文化的世界性输出,传播承载兼具“共同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更加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党内不良文化的发展和盛行一度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世界上的弘扬和传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就是要通过话语的整合和创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提炼和挖掘出来,将不良文化剔除出去,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提供文化支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

文化话语体系内含着价值上肯定的话语和能够转化为现实行为取向的话语,有助于引导和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走向世界。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构建的意蕴及其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包括重要的理念、价值观和制度规范在内的元素如何起源、演化并最终形成影响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观念体系,是一个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组织心理的建构,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历史发展的一种观念形态表达,也是中国共产党借以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概念框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包括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价值文化话语、制度文化话语、理论话语和形象话语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它既包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话语,也包括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提议并倡导的话语。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加强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建构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话语建构和传播促使政党文化转化功能的实现,以最大程度地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认同,“在于将科学的政权意识和先进的制度规范、党纪党风、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以及良好的政党形象有效地传送和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认同。”^[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建构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承担的历史使命,在对大众舆论进行回应的基础上对政党文化话语的相关要素进行优化,使得广大党员乃至人民群众将党所提倡的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为行,以提高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领导的全面加强和党

的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自身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政党形象。但是,由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党的建设尚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党的建设领域的各项改革正在推进之中,许多制度、措施的完善及其效果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从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远度来考量,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高度来思量,政党文化的话语主体、内容、话语环境及话语传播方式的变化无疑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 话语主体变化带来的挑战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先锋建构者,人民群众既是话语建构主体又是话语受众,三者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话语权建构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经历着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变,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民生、民信和民权的问题进一步突出。首先是体制层面出现了局部的“去组织化”现象,由于“多数基层党组织服务基层、服务农民的能力大大下降,城市街道居委会中的党组织,因缺乏制度化权能而无法把高度分化流动的人群有效组织起来”,再加上“一些基层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的作风问题、特权问题和腐败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且呈蔓延之势”^[6],致使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了弱化、虚化和边缘化问题^[7]。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其次,年轻党员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党员比例的上升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带来积极因素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年轻党员和高学历党员的认知结构、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需求都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政党文化话语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第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改革开放进入爬坡过坎阶段,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形成了利益诉求复杂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格局,个体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陷入了原子化境地,人们自主权利意识的增强进一步撕裂了传统社会

联结纽带,更是加剧了个体原子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党文化社会化遭遇了话语传播壁垒,一方面政党文化话语不能有效传达到每个个体;另一方面政党文化话语在传播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异,导致话语失真。

(二) 话语内容变化带来的挑战

当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面临着两大危险,一是被不良政治文化侵蚀和“同化”的危险;二是与民众相隔绝的危险,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呈现出稳定性与变动性相统一的特点,既要尽可能保持主要要素的相对稳定性,以引领政治进步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还要在稳定中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以新时代话语丰富政党文化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突出强调党的领导对于全面从严治党 an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性,突出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代明确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历史使命、建设目标、中心任务和领导方法等方面的变化,迫切需要政党文化话语内容的创新与发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个全面”、“党的领导核心”等为表征的话语的传播及其认同,要经历一个过程,广大党员对政党文化的话语接受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渐接受的过程。

(三) 话语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西方的胜利使得西方话语一度成了霸权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系统性的长久衰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要抓住资本主义演化的新趋势,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抗争性社会运动,将旧制度内的否定因素,转化为社会革命的积极力量;另一方

面,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推进以自我完善为路径的社会革命,运用政权力量提高人的解放的总水平。”^{[2](P83)}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政党文化话语单纯突出革命话语或者建设话语,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话语权建构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革命领导者”的政党文化话语。这种革命话语既体现在共产党的斗争性和动员性中,也体现在组织纪律性和集权性中。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压力得到缓解,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性和动员性不可避免地减弱了,新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亟需建构。因此,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等话语被引入政党文化,以凸显政党文化的革命属性和建设属性。1956年,毛泽东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中,把“艰苦奋斗”上升到“我们党的政治本色”的高度,“艰苦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话语标志。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同时指出“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生”。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锅饭”、平均主义色彩的政党文化向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务实色彩的政党文化的转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加强制度建设、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等话语被引入政党文化话语体系中。可以说,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切入点,以改革开放为主要依托,以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以发展、改革、人民和廉洁等为关键词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逐步构建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革命既具有政治性和斗争性,也具有建设性和过程性。“作为改变阶级命运的必由之路,革命是与战争高度一体的实

践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以暴力方式摧毁旧秩序的斗争实践,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现社会动员中展现的鲜明政治立场、政治纲领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8],革命不仅仅在于推翻旧政权,还包括建设新制度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革命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仍然不会少,作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过于忽视革命话语可能弱化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共产党人需要保持革命精神,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这给新时代政党文化话语权构建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需要构建兼具“共同价值”与“中国特色”的政党文化话语。

(四) 话语建构和传播方式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从还没有发展起来步入发展起来的转变,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转变;面临的主要矛盾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时代条件下,话语的建构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关于民族解放的叙事方式和关于主体权威的叙事方式契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话语需求,但是这种话语片面强调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普通民众日常境遇的关注及人的价值的探讨,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目标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全面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在政党文化话语权建构中更加关注普通人的价值,更加注意“回避宏大合法化图式而拥护异质性多元性”、构建“具有有限性”的小叙事。“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其使命、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9],这就要求在政党文化话语权建构中更加注意把初心使命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相连,把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相连。

此外,网络社会呈现出的扁平化结构也使得政党文化话语的传统传播模式受到挤压,在网络社会中所有网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网络成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或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文化传播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通过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的传输和教育来完成的,遵循传播主体——信息——媒介——受众——传播效果的单项传播模式。这种文化传播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要使党的主张和最新理念渗透到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政党文化的传统灌输式、单项式模式显然具有滞后性,与网络社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不适应,这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构建提出了新挑战。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党文化的现代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这就为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优化政党文化话语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要建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就要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价值话语、理论话语和制度文化话语的创新和构建入手,形成一种自我吸收、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良性循环话语生态,提高政党文化的引导力、吸引力、解释力和约束力,以更好地发挥政党文化的能动作用。

(一)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引导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根据南尼对使命型政党的定义,使命型政党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皈依。首先,该党具有不容改变的意识形

态;其次,它以转化大众的认知,让其认同该党的意识形态为使命^[10]。对于政党来说,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凝聚成员、争取群众的重要依据,如果政党意识形态缺乏话语权,政党就可能从一个捍卫共同利益的组织变成一种满足于眼前利益的政治选择的工具。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承载着政党合法性的主要内容,也承载着化解政党认同危机的能力。

创新新时代政党意识形态话语,首先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的集体,在现代社会中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1](P 前言 V-VI)要形成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要以更大的魄力进行自我革命,“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11](P31)

其次,要敢于同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作斗争,因为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年轻,越容易受到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更久远、更成熟,传播方式更加隐蔽,这就需要我们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自觉性。

第三,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体系建设,增强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尽管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这并不代表党的意识形态能自觉为人们所接受。历史证明,只有当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主题与民众需求高度契合时,意识形态才能够真正取得话语权。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12]增强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不仅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还要根据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接受心理,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工整合意识形态话语,使政党的意

识形态话语与百姓语言有机结合,增强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例如,我们党可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受众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话语解读方式,帮助受众了解政党立场、肩负使命和政治追求等;创作出更多的诸如“美好生活”、“中国梦”等,既能反映民众的共同利益诉求,又能体现每个价值主体富有差异性的生活气息的话语。

第四,要不断完善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机制,在实践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构建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指中国共产党拥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内的相关话语的建构、解释、规范及传播的权利和权力,以更加有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人类历史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1](P26)构建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要在实践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还要吸纳反映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现代化文化精神,包括对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创造性阐发,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等。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吸引力

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价值评价基点的需要是现实的“社会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个人需要”,即能够具体化为个体生存和发展利益的“社会需要”,因而,价值就是价值对象在其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意义^[13]。价值话语体系是人们为了对事物进行价值和意义判断而建立的一套是非、对错、美丑、荣辱、道德与非道德、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规范体系。正向的价值话语体系有助于政党文化的自我激活、自我开放和自我优化,以增进广大党员的政党文化认同。

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话语体系,

就是要回答为了什么的问题,提出一种能让民众接受和认同的政党价值。首先,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话语体系,要吸收历史上政党文化价值话语体系中的优秀因子。在抗日战争年代,以《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为代表的经典文献,以民族大义为基点^[3],以树立模范人物形象为叙事方式,以“五湖四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话语特色,构建起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文化价值话语体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等为代表的经典文献,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切入点,以“向雷锋同志学习”、“拼命精神”、“革命精神”“‘铁人精神’”为话语特色,构建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文化价值话语体系框架。服务为民的人生观、互助利他的社会观、奋发向上的人生观、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事业观和不怕牺牲的价值观等都是政党文化价值话语体系中的优秀因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话语体系要吸收这些优秀因子,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新的话语特色。

其次,要自觉凝练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价值观。政党价值观是政党关于自我利益和发展需求的集中体现,是政党从价值角度考虑政党问题的根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矛盾汇集并凸显,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交织,各种价值理念相互碰撞,原有的价值评判标准受到质疑,致使一些党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困惑或认同危机,这就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重视并凝练政党价值观。

明确清晰的政党价值观能为广大成员提供评判选择的内心标尺。可以说,任何政党的生存,实质上都是价值观的维系。只有价值观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吸引民众并满足其愿望和需求,政党才能迅速成长壮大;只有价值观更加鲜明、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政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14]。如果一个政党不能随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其价值观很可能会由先进变为落后。反之,如果政党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价值观,政党价值观也会由落后变为先进^[15]。就目前而

言, 尽管不同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价值观进行了概括, 例如, 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价值观概括为五个方面: 作为党的整体, 始终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以此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作为全体共产党员, 奉行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行为准则, 倡导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甘当公仆是基本的价值观; 以集体主义和相互合作调节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 勤劳朴素、精神充实的生活态度^[16]。有学者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 救亡图存、翻身解放的“革命”价值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价值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价值观;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价值观^[17]。2017年,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 “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18]2017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中明确要求, “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但是这些概括或者还有提炼的空间, 或者侧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政党价值观的凝练既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 也是引领和整合多元价值的过程。构建新时代政党文化价值话语体系, 一方面要通过回应现实满足政党成员乃至普通民众的价值期望; 另一方面要在引领和整合多元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政党认同感。

(三) 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理论话语体系, 提高政党文化的解释力

理论一词源于希腊语, 意思是判断或审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和认识是相联系的。安纳托尔·拉普波特认为理论有四层含义: 第一, 在特定条件下, 已被证实的关于客观现实的原理、定理或法则; 第二, 形成对事物客观认识的概念范畴; 第三, 在社会科学领域, 理论是关于人们行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第四, 在规范意义上, 政治

理论的应用往往倾向于研究“应该如何”^[19]。

好的理论不仅要描述客观现象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还要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解释它们这样联系的原因, 并根据已有的法则或运行规律对事件的发展进行预测。理论是历史的产物, 理论往往源于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分析, 是通过把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加以概括总结而得出的。也就是说, 问题或现象出现得越早, 对问题或现象进行解释或总结提炼的理论就出现得越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最早出现在英国, 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在国家和社会力量“斗争”的过程中, 政党作为争取政治权力斗争的组织化形式应运而生^[20], 最后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确定了角色。随着政党的产生, 政党文化也产生了, 政党的诞生意味着政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套共同的价值、认知、情感和动机。不久, 对政党文化这种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政党文化理论也诞生了, 例如, 阿克顿勋爵是这样描述英国辉格党的政党文化, “辉格党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把自由作为政党的目标, 它所追求的自由‘是政治的自由’, ‘妥协是辉格党人的关键信条’”^[21]。布赖斯在《现代民治政体》一书中指出, “政党的起源无论是什么, 其生存的及繁盛的原因是由人类心理中之四种倾向或心力之合流的作用; 这四种倾向就是同情、摹仿、竞争及奋斗”, “凡新加入的党员及新出的领袖都吸收党中已成的精神, 袭守向来的习惯。”^[22]也就是说, 西方政党文化理论是在对西方政党政治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 结合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现实进行分析, 抽绎出核心性概念和基本范畴, 再用这些概念和范畴建构出的框架体系和话语表达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是一个在帝国主义体系中为应对“中心”挑战而成长起来的革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理论话语产生的问题语境、目标语境以及理念语境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政策和选举, 政党往往通过向选民宣传本党的思想、政治态度和意见, 动员选民参与等方式赢得选民的支持。“正是从议会党到选举党的演进, 才确立了政党的基本功能、

功能角色和体系地位,确立了政党所赖以存在的理由”^[23]。进步观念、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和理性精神是西方政党文化理论产生的一般性的理念语境。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历史境遇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它的首要任务是整合社会资源、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主导现代化”、“培育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等重大任务。这是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理论产生的问题语境和目标语境。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和集体主义理念等是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理论产生的一般性的理念语境。

构建中国特色政党文化理论话语体系,首先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政党文化不仅具有阶级属性,还具有一般共同属性。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有政党文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也有政党文化,政党及其政党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性质,决定了人们在对政党文化进行认识和提炼概括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这类文化的一般特点及基本规律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观,即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而且这种利益是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胸怀天下的利益,“坚持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利益”^[24],是立足当下、关注人类未来长远发展的利益。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革命自觉,“他们胜过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作用的部分”^[2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中有一小部分理论精英已归附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成为“掌握着未来阶级”的阶级,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等中间阶级要免于灭亡,必须同无产阶级共同战斗,“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马克思设计的这种“由中心到外围、由上到下的等级化层级结构”的政党架构表明^[25],无产阶级政党文化是一种维护领导权威的革命文化。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至高追求是建

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信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取向、崇高信仰、理论自觉、革命自觉及其核心意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的核心概念纳入到中国特色政党文化理论话语体系之中。

其次,要凝练出政党文化理论的关键性概念和框架体系。西方学者建构的政党文化理论是围绕“选举”、“民主”、“政党领袖”、“资本”、“意识形态中间化”和“运作模式媒体化”等核心概念进行论述的,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政党文化理论话语体系不仅要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理念和理论范式,而且要凝练出政党文化理论的关键性概念,还要把“崇高信仰”、“自我牺牲精神”、“人民立场”、“领导核心”、“使命感”等核心概念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坚持把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把注重实践与理论提升相结合,为政党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和学理支撑。

(四)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制度文化话语体系,提高政党文化的约束力

制度文化话语是政党文化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政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发挥党的先进文化优势,祛除党内不良文化,就要发挥制度文化话语体系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来看,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形成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让国家治理更加现代化。制度的成熟定型离不开制度文化话语的变迁和建构,话语是制度文化变迁的直接动力,新的话语的大量产生和运用可以影响甚至破坏现有的制度文化。“制度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将自己依据的观念推广与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力图使人人都认知认同”^[26]。制度文化话语是意识观念与行为文化相契合的连接系统,制度文化话语机制的发挥能够使个体观念转化为集体行动。

根据话语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经由话语建构而成,没有描述和沟通行为的话语,就没有制度。

话语作为复数的“术语”,其含义为“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导入特定方向的制度化的意义结构”,影响着论证的提出和观念的呈现。话语能把那些富于技术和科学色彩的论述活动同公众更易接受的叙说方式结合起来,让技术专家们对相关事例、甚至更糟糕的局面所作的解释产生引人注目的故事性效果,从而促使社会成员在理解当前问题的原因时考虑应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并使其适应该社会的深层价值观^[27]。个体的自觉意识、自知之明及话语能力是维系或变革制度文化的重要变量。建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话语的制度文化话语体系,首先要提高广大党员的制度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话语正在实现向以国家和社会为轴心的以人为本、倡导民主和民权的话语叙事转换,这种转换的内在逻辑,就是以政党文化话语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既要发挥能动者的作用,又要发挥感知人的作用,因为围绕同一种制度,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感知与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制度能按照原先的设计原样施行,“话语不仅反映了观念,而且通过交往活动和协调活动的互动过程交换彼此的观点”,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通过交往活动和协调活动突破原有制度的范围,实现制度文化话语的更新。因此,有必要通过从上到下广泛而深入的制度宣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领会制度精神、了解制度内容,树立起制度面前一律平等、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形成定期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和敬畏及维护制度的意识。

其次,把更有力的说服性话语引入制度文化话语体系。所谓说服性话语指人们运用一定的词汇、修辞、叙事和框架分析等工具,使得语言对他人的行动产生约束性和使动性的效果。说服性话语不仅有助于他人做出判断或决定,甚至可以操纵人心。一般情况而言,说服性话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受众,一种是提供各种信息,包括真实、虚假、演绎、推论和归纳性的信息等;另一种是通过有关信号、细节或话语氛围来实现“伦理感染”。因此,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挖掘话语资源,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创新性发展和西方话语的创造性转换,整合出最能表达新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说服性话语,进而引入到制度文化话语体系,以此来强化新时代执政党话语的制度化权威。

第三,通过纵向的、逆向的、横向的联动思维方式使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的元素在制度文化话语的层面相互转化。既要以为问题为导向促使二者相互转化,又要以学习为动力促使二者相互转化。思想教育有助于将利益和偏好有差异的政党成员凝结在一起,形成思想共识。制度规范有助于通过行为规范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党成员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以便将个人的追求引到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轨道。一旦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能相融合,很多思想理念就能借助制度文化话语对广大党员产生约束力,二者的叠加效应使思想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思想,而是整个制度内含的思想理念,使制度成为一种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和“信仰”。

第四,要善于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汲取话语创新的活水,制度文化话语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的概念推演,而是在回应中国现实、解读中国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开放的话语体系。布莱彻认为,党控制官僚体系的制度方式主要有四种:党员和干部要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要参加生产劳动并定期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党员要接受彼此的批评,同时展开自我批评;党员要接受党外群众的批评;党内设有专门的制度渠道,收集自下而上的意见和批评^[28]。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话语体系需要从保持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汲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铁有痕等话语,也需要从民间话语、大众话语和网络话语中汲取智慧,在多元话语的互动与融合中实现创新。

四、小 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

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9]新时代,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坚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政党自信归根结底是政党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政党文化是一个开放式的、不断创新发展文化,要保持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先进性,就要用政党文化话语引领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政党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的一般共同属性,还具有特殊属性,这就决定了人们在对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进行认识和提炼概括的过程中,不仅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的一般特点及其基本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包含着基于自身特有的文化土壤和新的政党文化建设实践之上的特殊性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建构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原理,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与现代性规则融合互动的过程,是根据实践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要在时代高起点上推动政党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创新,向世界提供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被世界认可的政党文化理念,要确立政党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原则,构建新时代政党文化的学术话语、理论话语和制度文化话语体系,防止政党文化的“失语症”。

参考文献:

- [1] 赵凌云,李益鹏.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J].红旗文稿,2016,(19):12-14.
- [2] 姜辉.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2).
- [3] 吴波.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范式——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为例[J].党的文献,2019,(2):52.
- [4] 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8,(3):225.
- [5] 李冉.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81.
- [6] 郭为桂.再组织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及其制度化导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1):15-16.
- [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3.
- [8] 蔡志强.革命逻辑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J].思想理论教育,2019,(6):5.
- [9] 郑永年.大趋势:中国下一步[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59.
- [10] 刘宗洪,袁峰.党史与党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336.
- [11]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32.
- [13] 李金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和谐社会价值观建设[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61.
- [14] 江必新,刘伟.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97.
- [15] 石国亮.政党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J].长白学刊,2008,(2):112.
- [16] 欣文.党的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走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2,(5):41-44.
- [17] 段妍,杨晓慧.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发展历程[J].学术交流,2013,(12):27.
- [18]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7,(1):6.
- [19] Anatol Rapoport. Various Meanings of Theory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8, 52(4): 972-988.
- [20] 陈琦.衰落还是转型: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变化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2.
- [21]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6-358.
- [22] (英)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上)[M].张慰慈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14.
- [23]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6.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 [25] 李海青.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溯源——对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解读[J].哲学动态,2018,(5):10.
- [26] 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05.
- [27] (美)维维恩·A·施密特.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J].马雪松,田玉麒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7):13.
- [28] Marc Blecher. China Against the Tides: Restructuring through Revolution, Radicalism and Reform, 3rd Edition

[M].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2010.98. 36.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周琨】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of CPC's Culture in the New Era

PAN Na-na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Abstract: On its way to future and making itself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party in the worl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ust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power for its culture and give guidance in this regard to hold high ground in science and morality. The discourse of the party culture has the main functions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value integration,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changes in the subject, content, environment and dissemination mode of the party's cultural discourse undoubtedly present many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discourse of CPC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we should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of the CPC's par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its guiding power. We also should construct the valu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ar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o boost its appeal, make it more persuasive, and increase its binding force.

Key words: new era; the CPC's culture; discourse power; political party identification; construction path